

杜文玉◎主编

# 唐史论丛

第二十一辑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 《唐史论丛》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排名)

宁 欣	孙继民	严耀中
杜文玉	辛德勇	冻国栋
张国刚	陆 扬	陈明光
荣新江	拜根兴	贾二强
高明士	黄正建	谢元鲁
雷家骥	薛平拴	魏明孔

# 唐史論叢

杜文玉 主編

第二十一輯

陝西師範大學唐史研究所  
中國唐史學會

主辦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史论丛.第二十一辑/杜文玉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518-1103-3

I. ①唐… II. ①杜… III. ①史评—唐代—丛刊  
IV. ①K242.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8291号

---

唐史论丛 第二十一辑

杜文玉 主 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103-3

定 价 65.00元

---

网 址 [www.sqcbs.cn](http://www.sqcbs.cn)



# 目 录

日本历史学界东亚世界论的再探讨 ——兼与韩国学界的对话 ..... (日)李成市撰,王坤译	001
唐都长安与新罗庆州.....	拜根兴 016
东亚视野下的百济人祢军墓志 ——以“日本余噍”和“僭帝称臣”为中心 .....	马云超 037
隋唐时期佛舍利信仰与崇拜在东亚的传播.....	杨效俊 050
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研究六题.....	张学锋 065
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西密东疏”分布格局探析.....	刘兴成 083
唐代的“合朔伐鼓”及其象征意义.....	赵 贞 096
唐玄宗御容铜像广布天下寺观考辨.....	聂顺新 108
唐代中期战争的时空分布特征.....	王效锋 127
唐代宦官刘弘规家族世系考述.....	杜文玉 140
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考订补.....	徐 畅 151
唐代图形高僧考.....	王兰兰 173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新补.....	刘思怡 186
枕上浮生:长安新出隋代梁衍墓志铭与枕铭疏证.....	周晓薇 王其祎 196
唐代宰相《杨绾墓志》跋.....	赵振华 212

唐嗣吴王墓志铭相关问题考释 .....	梁 丽 220
唐元庭坚墓志考释 .....	王梓奕 王雪玲 229
《唐侍书僧崇简墓志》跋 .....	介永强 240
涑源县兴文塔铭：唐代蔚州铜冶铸钱作坊的珍贵资料 ...	孙继民 245
《兴文塔铭》：唐代“草根”的吟唱 .....	李沁锴 260
五代荆南政权割据原因再探 .....	张跃飞 267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制的变化及特点 .....	刘 喆 277



## CONTENTS

1. Re-discussion on the Japanese Historians' Opinions of East Asian World —— Dialogue with the South Korean Academic..... (JPN) Li Chengshi, (Translation) Wang Kun
2. The Tang Dynasty Capital of Chang-an and the Qing-zhou of Silla ..... Bai Genxing
3. Analysis on Epitaph of Baekje Mijun from an East Asia Prospective Focus on Rib-enyujiao and Jiandichengchen..... Ma Yunchao
4. Faith and Worship of the Buddha Sarira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Its Spread in East Asia ..... Yang Xiaojun
5. The Study of Emperor Yang of the Sui's Tomb from Six Aspects ..... Zhang Xuefeng
6.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s and Noble Residence Distribution of the Da-xing City in the Sui Dynasty ..... Liu Xingcheng
7. The Symbolism of Beating Drum on the New Moon in Tang Dynasty ..... Zhao Zhen
8. Were the so called Xuanzong (玄宗) Emperor's Bronze Statue Widespread in both Buddhist and Taoist Monasteries of the Whole Country in the Tang Dynasty? ..... Nie Shunxin
9.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of the War in the Mid-Tang Dynasty ..... Wang Xiaofeng
10. The Research of the Family and Lineage about Eunuch Liu Hong-gui in the Tang

Dynasty .....	Du Wenyu
11.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 of Wan Nian and Chang An Country in the Tang Dynasty .....	Xu Chang
12. Textual Research about the Eminent Monks in the Tang Dynasty .....	Wang Lanlan
13. Some New Complement and Correction to the Genealogical Table of Royal Clan of Tang Dynasty in XINTANGSHU .....	Liu Siyi
14. Study on the New Found Epitaph and Other Texts of Liang Yan in the Sui Dynasty .....	Zhou Xiaowei, Wang Qiyi
15. Investigation on the Prime Minister Yang Wan' s Epitaph in the Tang Dynasty .....	Zhao Zhenhua
16. Investigation on Si Wu Wang' s Epitaph in the Tang Dynasty	Liang Li
17. Textual Research on Yuan Tingjian' Epitaph of the Tang Dynasty .....	Wang Ziyi, Wang Xueling
18. Investigation on Monk Chong Jian' s Epitaph .....	Jie Yongqiang
19. Inscription of Xing-wen Tower: Precious Materials of Copper Metallurgy Workshop in Wei State in the Tang Dynasty .....	Sun Jimin
20. Inscription of Xing-wen Tower: The Voice of Civilians in the Tang Dynasty .....	Li Qinkai
21. Restudy on the Reasons of the Independent of Jing Nan Government in the Five Dynasties .....	Zhang Yuefei
22.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parat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	Liu Zhe



# 日本历史学界东亚世界论的再探讨

——兼与韩国学界的对话

(日) 李成市文 王 坤 译

## 前 言

“东亚世界论”最早出现于1960年代，但作为系统性理解世界史框架（世界史中的日本）的学说，是由西嶋定生先生于1970年提出的。对于战后的日本史学界而言，可以说其发挥着通用性理论的作用。

在日本史学界所使用的“东亚”的概念，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在东亚世界论的影响之下。例如，东亚世界论的理论基轴，是中国帝王与周边各民族酋长间形成的政治关系，即册封体制。在探讨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时，大多都依据该理论，或是从其基础框架中派生出来的观点<sup>[1]</sup>。

本文的目的，并非在于对所谓“战后日本史学界通用理论”的东亚世界论的宣扬。可是，尽管“东亚世界论”的提出已过去近半个世纪，而且也曾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外的各种批判，但该理论仍然确定了日本世界史教科书的历史性叙述，以及现今国际学术界相关学术论文的框架<sup>[2]</sup>。可以说，迄今为止，学界依然没有提出

---

[1] 李成市：《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东京：山川出版社，2000年；同氏《被创造的古代》，首尔：三仁出版社，2001年。另外，以下关于西嶋的东亚世界论，此前拙稿亦有论述，参见李成市：《关于近代国家的形成与日本史的备忘录》，《现代思想》1996年8月，第28~29页。

[2] 关于西嶋的东亚世界论，以及作为其基础的上原专禄的世界史构想，直至今日，仍然是构成日本世界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羽田正在其《通往新世界：为了地球居民的构想》（东京：岩波书店，2011年）中曾有过详细的分析。另外，白石隆、Hau·Caroline共著的《中国如何改变东亚：二十一世纪的新区域体制》（东京：中央公论社，2012年）对于册封体制论所派生出的朝贡体制有如下表述：从朝贡体制的观点来论述随着中国崛起而变化的东亚的学者，在中国以及中国之外都不少，在世界体制论的研究者中，也有人试图概念性的扩大朝贡体制，既而构想东亚秩序的（123页）。另外，关于滨下武志所提倡的朝贡体制论与东亚世界论的关系及其问题点，在拙稿《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见前注）中有所论述。

可以替代“东亚世界论”的理论。

诚如科学史的范式论告诉我们的，只要新的理论没有超越，其批判性就不会获得力量。然而，个别性的批判，也会使通用性理论放弃所包含的总括性原理，也就是对其理论所定义的各种事实的背弃。这就要求我们应该积极地，对于失去定义的诸多史实，再次赋予新的阐释。这也是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可以替代东亚世界论，并能够概括性地阐述区域历史理论的原因所在。

因此，本文之所以积极地探究东亚世界论，并非是为了拥护东亚世界论，而是要启发学界能够提出替代该理论，而且是具有说服力、建设性、批判性的历史构造论。因为脱离本质的模糊性批判，只会让超越原有理论变得愈发困难。

实际上，诚如本文所论，大多数论者运用个别的、具体的历史现象来批驳东亚世界论是难以成立的。当然，若无法解释个案的理论，作为其理论本身也就无法成立。但是，按照前述的科学范式论，只要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新理论，以前的理论就不能弃之不顾。

历史是当下活着的我们对于过往的追问，既是理解当前的现状，也是确定今后发展趋势的方法，因此，历史对于我们而言是必要的。而对于过去的追问也应随时代而变化。东亚世界论及其构筑和描绘的历史像，正是要求产生理论的时代产物。历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如果其理论仍然维持着的话，日本历史学界对于现实与过去的追问，就有发生齟齬的可能。

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以东亚世界论为线索，通过探讨日本史学界的问题意识，期待成为讨论韩国史学界东亚论的素材。

### 一、东亚世界论的内容与构造

在现今的日本，“东亚”的地域名称究竟涵盖哪些区域并未确定。在新闻界及社科学界，一般指的是 ASEAN+3（中国、韩国、日本）。但是，在历史学界，“东亚”一般指的是“东亚世界”这一历史性的文化区域空间。即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包括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等一定区域的整体性概念。这种说法来自于西嶋理论化了的东亚世界论。将前近代的东亚看作是由一种构造形成的区域性世界，而发现这一世界结构性机制的是西嶋，其理论体系被称为“东亚世界论”。

西嶋在东亚区域的设定方面，首先是着眼于东亚固有的文化圈<sup>[1]</sup>。该文化圈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形成的，具体而言，即以汉字为媒介，接受了儒家思想、佛教、律令制等源于中国文化的区域。这个文化圈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国、韩国（韩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区域。

倘若“东亚”就是中国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的话，那么，作为形成该文化圈的前提——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与周边各国、各民族间的关系就存在着问题。汉代以降，中国帝王通过加封周边各国、各民族首领中国爵位而结成君臣关系。因为这种中国帝王与周边各国、各民族首领间，通过官爵授予而缔结的关系是以册封的形式任命的，故称之为“册封体制”<sup>[2]</sup>。

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包括了现今中国、韩国、越南、日本在内的“东亚”区域构成了一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也并非只是文化的扩展，其背景是册封体制这一独特的政治构造的存在，中国文化是以这种构造为媒介传播开来的。这种文化圈与政治圈合体形成的自我完整的世界，西嶋称之为“东亚世界”。

如前所述，西嶋提出的东亚世界论的基本构想，最初发表于《六至八世纪的东亚》（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1962年），而在《序说：东亚世界的形成》（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970年）一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东亚世界论的理论框架<sup>[3]</sup>，两者之间是彼此互补的关系。其中，后者可以看作是西嶋所构想的“东亚世界论”的宣言。根据这种构想，“东亚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世界，是一个具有自我完整性的文化圈，并且是一个由独特的政治构造形成的有机关联的区域，是自古以来，贯穿于整个前近代时期且具有历史依据的区域性世界。前一篇论文，是对东亚世界作为具有自我完善性政治构造机理的册封体制的阐述。论证了从6世纪至8世纪，中国王朝通过与东方各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渤海）缔结关系，将中国王朝为中心的政治机制发展为东亚国家互动的基础，明确地规范了东亚各国间关系的政治秩序（册封体制）。

此处提出的所谓“册封体制”，就是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推动东亚国际秩序和局势发展的一种形式，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该体制为媒介实现的。这种体制一经

[1] 西嶋定生：《序说：东亚世界的形成》，东京：岩波讲座《世界历史》（4），1970年。

[2] 西嶋定生：《六至八世纪的东亚》，东京：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1962年。

[3] 西嶋定生、李成市编：《古代东亚世界与日本》，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

实现，就开始了基于其理论自我运动，同时伴随着文物制度（文化）的传播。册封体制理论一经发表即引发很大反响，同时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是：册封体制忽视了限制国际关系发展的各国间的实力关系，是对国际关系主体及周边各国、各民族主体性外交和发展的轻视<sup>[1]</sup>。另外一点是，所谓“册封关系”只不过是“中国帝王与周边各民族关系中极其有限的一种关系，它只不过确定了与周边各民族关系的一部分”<sup>[2]</sup>。尤其是后一点，是册封体制论的本质性问题所在。但是，这些批判在当时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就如库恩的范式论<sup>[3]</sup>所指出的那样，册封体制论一直作为史学界的统治性理论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作为反证的个别案例是很难有较强的批判性的。无论如何，现在看来，册封体制论是通过对某一限定的时代和区域的分析而抽象出来的政治构造论，但并不是没有重新探讨的必要<sup>[4]</sup>。尤其重要的是，册封体制这一政治构造是以中国文化向东方各国传播的事实为前提的。在随后的时段内，不加论证地扩大和延长其地域和时代，而只讨论以册封为媒介形成的文化圈。西嶋所尝试论证的归根到底只不过是6至8世纪的中国王朝与东方各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倭、渤海）的关系，以爵位为媒介将中国文化扩展至除倭国以外的其他四国。如果仔细考察唐代的国际关系就会明白，其实唐代国际关系的重心在于与中亚及西部各民族的关系，之后中国王朝的国际关系才波及到更大范围<sup>[5]</sup>。近来，主张将东亚世界的概念，从这种国际关系的存在方式

[1] 鬼头清明：《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东亚》，东京：校仓书房，1976年。

[2] 堀敏一：《律令制与东亚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另外，尽管是基于西嶋的册封体制理论，但也有主张不仅是册封体制，也包括了朝贡关系，应该说有一种从古代直到清代的“中华世界秩序”的结构。其实这是因为仅以册封无法把握以清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结构而提出的见解。譬如，滨下武志所提倡的“朝贡体制论”，他将清代的国际关系图片化。尽管“朝贡”和“册封”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关系，但是将“朝贡”关系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实体化，进而看作是追溯过去千百年来发生作用的秩序，这是其理论的特征。（《朝贡体制与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年）这种朝贡体制论在“东亚”区域是不会成为问题的，因为所有来到中国王朝的，都是“朝贡”的。

[3] [美]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2.

[4] 参见李成市：《东亚文化圈的形成》，第44~48页。

[5] 石见清裕：《唐代的国际关系》，东京：山川出版社，2009年。

向欧亚大陆东部区域扩大的见解在日本史学界占据上风<sup>[1]</sup>。

不仅是国际关系展开区域的问题,更不可忽略的是,所谓东亚各国对于儒家思想、佛教、律令等的接纳,发现与中国各王朝形成的册封关系之间,直接性的关联事例并不多见。譬如,近年来在朝鲜半岛发现的石碑及木简等,表明汉字文化与“册封体制”之间并无关系,而是在朝鲜半岛内,或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的区域内得以传播和接纳。佛教、儒教、律令也同样如此,未必是以与中国帝王的政治关系为媒介在上述区域间传播的<sup>[2]</sup>。就是说,虽然册封关系在东亚是产生政治变化的原动力,但却不能认定,文化圈的形成仅与中国帝王间册封式的政治关系有联系。况且,中国文化的传播绝不是通过册封来实现的。东亚世界文化圈的形成机制,尽管包含了册封关系,但是仍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按照相邻各国间的传播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总括性的探讨。

## 二、东亚世界论及其形成的背景

西嶋是在考察了前近代东亚区域近两千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之后,以此为框架倡导了“东亚世界论”。实质重在强调从古代到20世纪,在日本历史展开过程中留下印迹的可能性<sup>[3]</sup>。实际上,与其说东亚世界论是以东亚为对象,不如说西嶋更加倾向于思考与日本历史深刻相关的问题<sup>[4]</sup>。从根本上讲,“东亚世界论”的构想,就是为了克服战前体制下,主观异端化了的日本史观(皇国史观),是一种要重新在世界史的语境中理解日本史的尝试。究竟如何理解东亚世界中的日本

[1] 在2010年和2011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年会上,提出了替代东亚世界论的“欧亚东部论”。2011年,在历史科学协会“世界史认识与东亚”的学术研讨会上,山内晋次对于东亚世界论提出了批判,并提出了“东亚欧亚大陆”的视野。主要相关论文如下:广濑究雄:《倭国·日本史与东部欧亚大陆:六至十三世纪的政治关联再考察》,东京:《历史学研究》,第872页,2010年10月;山内晋次:《“东亚史”再考》,东京:《历史评论》第733页,2011年5月。

[2] 李成市:《高句丽文明在东亚的位相》,《石门李基东教授退官纪念论丛·韩国古代史研究的现阶段》,首尔:周留城出版社,2009年;工藤元男、李成市编:《东亚古代出土文字资料研究》,东京:雄山阁,2009年。

[3] 西嶋定生:《东亚世界与日本》,《历史公论》1~2—11,1975年12月~1976年11月,收入《古代东亚世界与日本》,岩波书店,2001年;同氏著《所谓中国历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4] 李成市:《近代国家的形成与日本史相关记载》(同前)。

史、日本文化，成为西嶋经常关心的重要问题<sup>[1]</sup>。

因此，对于西嶋而言，很有必要再次叩问，究竟什么是促使“东亚世界”形成的历史性因素。也就是说，探寻“东亚世界论”的由来，就必须追溯到1950年代，回归到与当时环境密切相关的现实中去。在其晚年的随笔《关于世界史像》一文中明确地道出了这一理论形成的经纬<sup>[2]</sup>。该文刊登于1990年代新刊行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上，有感于曾作为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970—1974年刊行）编修委员，是如何投身其间时谈到的。据此文所述，在制定前一次《世界历史》的编撰方针时，西嶋作为执笔者之一，曾参与策划《日本国民的世界史》（岩波书店，1960年），随后将当时形成的构想进一步发展，构筑成新的世界史图像。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通过该文可以看到，西嶋的“东亚世界论”是作为世界史图像体系中的一部分的。涉及到“世界史图像”时，西嶋指出：地球上的各个区域是在19世纪以后才发展成为单一性世界的，而之前地球上存在着若干个复数的世界。其中，16世纪以后是欧洲涵摄各世界，进入19世纪后，近代世界发展成为泛全球性规模的单一世界。

实际上，上述认识是来自于曾任《日本国民的世界史》编者的上原専禄先生关于世界史的构想<sup>[3]</sup>。上原作为历史学家，一生致力于探究“世界史图像”的自主性形成，并以其作为国民性课题的研究而著名。自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上原时常痛陈日本人对于“世界史中的现代亚洲”问题意识的淡薄，并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作为美国的政治随从，是无法真正直接面对战后亚非各国，也无法真正地发挥世界史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以欧洲人为统治对象而建立的欧洲人的秩序（单一世界）。将这种欧洲人的秩序与亚非各国结合，否定其统治性和附属性构造，实现结构性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迫切应对的课题<sup>[4]</sup>。据上原所言，倘若欧洲人的世界史观是欧洲人为了解决欧洲固有的历史问题，而从其历史发展的深层思

[1] 西嶋定生：《缘何将日本史作为世界史理解是必要的》，载前注《所谓中国历史研究》。

[2] 西嶋定生：《关于世界史像》，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25卷月报，1997年，收入《古代东亚世界与日本》。

[3] 西嶋定生：《八年间的讨论会》，《图书》，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

[4] 参照上原専禄所著：《民族的历史性自觉》，东京：创文社，1953年；《亚洲人的心理》，东京：理论社，1955年；《世界史图像的形成》，东京：创文社，1955年；《世界史中的现代亚洲》，东京：未来社，1956年；上原编：《日本国民的世界史》，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



考解决之道的話，那么，日本就应该与亚非各国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历史性课题，必须重新构筑属于自己的世界史观，即提出了一种“哥白尼式转变”的构想<sup>[1]</sup>。根据上原的观点，真正意义上的单一世界是在进入近代以后才形成的。他认为近代以前，并存着若干个独立的世界。也就是说，在这些并存的世界中不存在一体化的世界，而是并存着拥有各自固有文化和区域性整合的、具有相互独立性的若干个世界（东亚世界、东南亚世界、印度世界、伊斯兰世界、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东欧、西欧、北欧、苏维埃、美国、加拿大和大洋洲）。到了近代，这种多样化世界并存的状态才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被迫地转变为单一性的世界构造<sup>[2]</sup>。对于上原而言，这种逐渐被一体化的过程才是世界史中唯一的。这种一体化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展开的，那些诸如“东亚世界”、“印度世界”、“伊斯兰世界”、“西欧世界”等现在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着，这些都需要通过重新地探讨来明确其历史性特征及问题。以此种视角看待世界时，发现1950年代至60年代，东亚的实际是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四国在世界政治的问题结构中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即上述四国任何一个都面临着民族独立的问题，都处于以美国的“越战”为媒介的，由国家间矛盾、民族间矛盾对立的共同背景而形成的区域世界<sup>[3]</sup>。具体而言，即朝鲜半岛的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地区，中南半岛被南越和北越分割，在日本则是冲绳问题等等。存在着诸如此类种种矛盾的东亚，意识到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不得不予以斗争。在这一点上，东亚是有着共通性和一致性的。正因为理解了这种共通性，越南才是东亚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仅将这些区域当作拥有现代矛盾的政治圈，追溯近代以前的历史，作为解决矛盾共通基础的文化圈就自然浮现出来。

从其回忆中可以看出，西嶋继承了上原的这种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课题的问题意识，至少提出“东亚世界论”的契机，是以上原的世界史像的构想为前提的<sup>[4]</sup>。

[1] 上原关于“世界史战略”的理解，大多得益于小岛杰的教导。

[2] 上原專祿：《世界史像的新形成》，载《世界史讲座》月报1，东洋经济新报社，1954年；收入《世界史像的新形成》，东京：创文社，1955年。

[3] 上原專祿：《历史研究的思想与实践》，《历史地理教育》，1964年，第102期。

[4] 西嶋自己就“东亚世界论”与上原的“世界史像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仅在西嶋以随笔形式发表的《关于世界史像》（见前注）中有所陈述，除此以外均未曾言及。

以上原所理解的东亚区域的实际为前提,拥有这种一致性及有机关联性的东亚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历史性的、有依据的世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探寻这种关联性,并使之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就是东亚世界论。总之,东亚世界论的构想源自于战后日本人所面临的危机,在东亚世界论酝酿诞生的当时,是与日本和亚洲的现实性课题密切相关的。

### 三、东亚世界论与近代日本的东亚秩序

从战后日本人对于现实的危机意识开始,要求一种能理解当时东亚世界的理论,而回应这种要求的正是东亚世界论。但是,在日本史学界尚未论及,二战前形成的、与东亚世界论截然不同的,所谓政治思想体系区域论“大东亚共荣圈”与东亚世界论之间的关系。尽管东亚世界论是从现实性的课题发展而来的优秀构想,但即使是表象地讨论两者关系的都不曾有过。事实上,在韩国“东亚论”登场的1990年代,日本所讨论的“东亚世界论”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关系也曾受到怀疑。相比较而言<sup>[1]</sup>,这种未被讨论的事实中往往包含着不可轻视的问题。

如前所述,东亚世界论的构想是发端于战后日本人直面危机的意识。而西嶋东亚世界论形成的重要契机,就是与上原所共著的《日本国民的世界史》一书。在该书最后一章阐述了“当今的世界史性课题”。即,在论述了1950年代的苏联、中国、美国、亚非国家的任何一个民族正在致力于解决迫切性的课题“现阶段的世界史”之后,在最后一章做了如下的总结:

我们日本国民在当今世界是被置于重要的国际地位上的。在“二战”战败后,国内体制的民主化成为重要的问题,进而随着国际局势的紧张,我们沿着从属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化军事体制的方向发展,和平与真正的独立成为重要的议题。这种动向在朝鲜战争中,通过《旧金山和约》与美国缔结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得以强化。这种关系与近来的首脑会谈及其他局势缓和的预计相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种关系被看作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尤其是对于苏联和中国而言,更被认为是直接性的威胁。对于如何应对这种新形势不仅是日本人自身的问题,也应

[1] 李成市:《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被创造的古代》,参见前注。



该为不断发生着转变的世界所注目。要求我们日本国民形成针对该课题的“世界史性认识”，尤其是要求养成积极应对这种课题的主观性意识。<sup>[1]</sup>

在此，是以 1950 年代的“世界的现阶段”为着眼点阐述日本课题的，但此课题的由来，却是把 1945 年之后的日本作为决定性的转折点来对待的。而且并非止于此，该文中上原、西嶋两位对于“东亚”过去的追问包含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在文中，作者有力地阐述了 1945 年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点的同时，又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历史节点，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既是现代日本的出发点，又是在与“后 1945 年时代”的对话中，形成自己的历史观的<sup>[2]</sup>。

譬如，若要问中国人理解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世界时，是在与哪个历史时期对话的话，就会回答“最多的对话对象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时期，或者追溯到 1840 年代”<sup>[3]</sup>。以此为例，若要问韩国人对于现在的韩国、现在的东亚、现在的世界的看法时，是在与哪个时代对话，回答应该是 1894 年的甲午战争（日清战争），进而追溯至 1860 年代的大院君时期，至少也会想到高宗时代。实际上，作为东亚三国的文明论及联合论的东洋主义，是在 19 世纪末以后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sup>[4]</sup>，乃至包括安重根的“东洋和平论”，都是在围绕着朝鲜半岛的东亚国际环境发生激变的时代，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挫折以及被殖民地化过程中，朝鲜独立和东亚联合的思想才得以兴起的<sup>[5]</sup>。

以上笔者比较了“日本东亚世界论”和“韩国东亚论”，分析了 1990 年代在韩国出现东亚论的历史背景，以唤起对于日本与韩国两种理论间存在着较大差异的关注。日本的东亚世界论有着日本固有的语境，所以有必要强调其相对性，忽视这一点而将其作为国际化议题等而视之是不可行的<sup>[6]</sup>。

[1] 上原专禄编：《日本国民的世界史》，第 372 页。（参见前注）

[2] 刘杰：《亚洲现代化的问题：区域内外的和解与历史认识》，收入有马学、松本健一等著《现在如何讲述亚洲》，福冈：弦书房，2011 年，第 83 页。

[3] 刘杰：《亚洲现代化的问题——地域内外的和解与历史认识》，同注 [2]，第 85 页。

[4] 都免会：《自主的近代与殖民地的近代》，收入宫嶋博史等编《殖民地近代的视点》，东京：岩波书店，2004 年。

[5] [韩] 白永瑞：《联动的东亚、作为问题的朝鲜半岛：言论与联合运动的 20 年》，《创作与批评》，2010 年春季号，首尔。

[6] 李成市：《为何如今是“东亚史”》，收入有马学、松本健一等著，《现在如何讲述亚洲》，福冈：弦书房，2011 年。